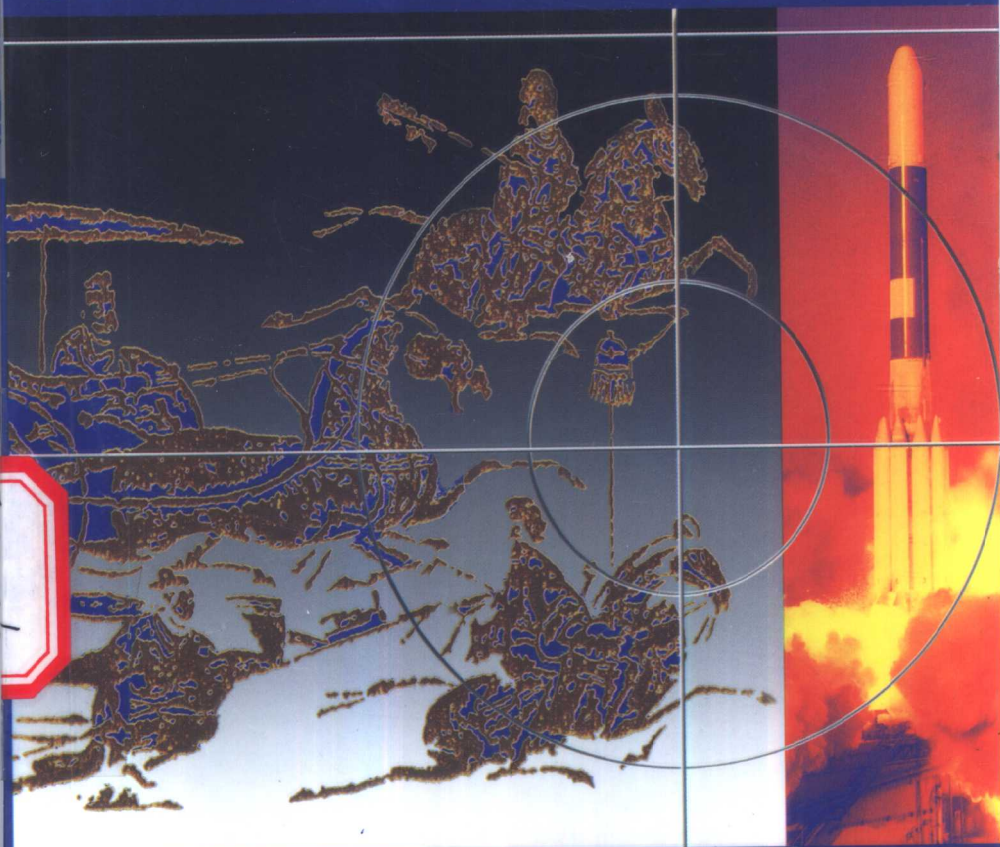


孙子兵法

魏黎波 王新华 编著

今读

SUNZI BINGFA JINDU



国防工业出版社

孙子兵法今读

魏黎波 王新华 编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子兵法今读/魏黎波,王新华编著. —北京:国防
工业出版社,2003.2

ISBN 7-118-03103-8

I. 孙... II. ①魏...②王... III. 孙子兵法 - 研究
IV. E8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8746 号

 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北京奥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5¼ 138 千字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一颗夺目的明珠。几千年来,它不仅在中华文明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而且越来越受到世界的认可和重视,被奉为兵学“圣经”、战争宝典!

《孙子兵法》十三篇不仅自成体系,独放异彩,又与其它各家思想相融相通、映至成辉,集古代中国军事、政治、外交谋略思想于一身,在文学、哲学、管理学、心理学等领域也成就卓著。

我们从1995年开始在燕山大学本科生中开设“孙子兵法与谋略”选修课,受到广大同学的热烈欢迎。为了配合高等院校实施素质教育和社会各界人士学习、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我们以《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基础,认真修改完善讲义,融合大量古今战例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编写了这本《孙子兵法今读》。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著作及报刊文章,汲取了其中有益的见解,引用了部分材料。我们力求将两千多年前孙子提出的伟大思想与现实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的新思路,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李保东教授、杨晓峰教授对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国防工业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忽纰漏,所写内容亦难尽如人意。不足之处,恭请各位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编 者

2003年1月

目 录

绪论 孙子与《孙子兵法》简介	1
第一篇 计 篇	5
第二篇 作战篇	20
第三篇 谋攻篇	29
第四篇 形 篇	42
第五篇 势 篇	51
第六篇 虚实篇	62
第七篇 军争篇	74
第八篇 九变篇	86
第九篇 行军篇	95
第十篇 地形篇	106
第十一篇 九地篇	117
第十二篇 火攻篇	132
第十三篇 用间篇	141
结语 《孙子兵法》军事思想总结	150
参考文献	163

绪论 孙子与《孙子兵法》简介

古今中外,无论挑选最古老的军事家,还是评比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的孙武,无疑都是当之无愧的。孙武是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学家,他是中国兵家的鼻祖,也是世界范围内言兵的圣人。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一书,是迄今保存最古老、流传最广泛的军事著作。国内外学人称孙武为“兵圣”,称《孙子兵法》为“兵经”或“武经”。

孙子简介

孙子,名武,字长卿,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后期——公元前5世纪前期。《史记》说他为“齐人”,《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说他是“吴人”。据考证:孙子本齐人,后迁于吴国。

孙子生活的时代,是风云变幻的春秋末年,奴隶社会行将崩溃,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向奴隶主阶级展开了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领域各方面的斗争。这同样是一个圣贤辈出的时代。当时,周有老聃,是道家创始人;鲁有孔子,是儒家创始人;齐有晏婴,是墨学先驱;吴有季札,是博物学家;郑有子产,是法家先驱。他们都是当时一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孙子,则成为这个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是军事科学的创始人。

孙武所出生的齐国,自古有知兵善战、崇尚权诈的传统。孙武的祖先本为陈国的公子陈完的后裔。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逃奔齐国避难。齐桓公委以“工正”之职,管理手工业生产。陈完后来又改姓名为田完。田氏几代以后,居然发展为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孙武的家族多武将,其曾祖田桓子,《史

记》说他“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是兼有军事、政治之才的人物。嫡出的田乞长于攻心，先发制人，是善于权谋的政治家；其祖田书善战，在齐攻打莒国的一次战争中立下战功。齐景公便把乐安（今山东惠民）封给田书，作为他的采邑，并因功赐姓孙。比孙武稍后的田穰苴，是孙武的同姓，也是田完之后，以善于用兵为齐威王司马，后人将他的作战经验与世传“司马法”合编，成为《司马穰苴兵法》，简称《司马法》，穰苴既是军事实践家，又是军事理论家。

公元前 530 年前后，齐国发生“四姓之乱”。为躲避国内的政治动荡，孙武来到吴国，在伍子胥的推荐下，孙武携带《孙子兵法》十三篇到吴宫去晋见吴王。在回答吴王的提问时，孙武那惊世骇俗的议论，新颖独特的见解，引起了一心图霸的吴王的深刻共鸣。他连声不迭地赞誉孙武高妙的战争见解和横溢的军事才华，于是当即任命孙武为将军。

历史记载，在这次召见中，曾有孙武吴宫教战，斩吴王美姬的故事，这不过是一个军事寓言。它旨在说明，孙武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不是旨在说明“以法治军”。

孙武为将之后，为吴国的兼并战争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西破强楚，入郢城，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意思是说，公元前 506 年，吴军对楚国实行深远的战略奇袭，攻占楚国首都郢城，孙子有战功；公元前 484 年吴军在齐国艾陵重创齐军，公元前 482 年黄池会盟，吴国取代了晋国的霸主地位，这就是“北威齐晋”，孙武也有不可磨灭的战功。从公元前 512 年任将军到公元前 482 年的黄池会盟，孙武在吴国有着 30 年的戎马生涯。

《孙子兵法》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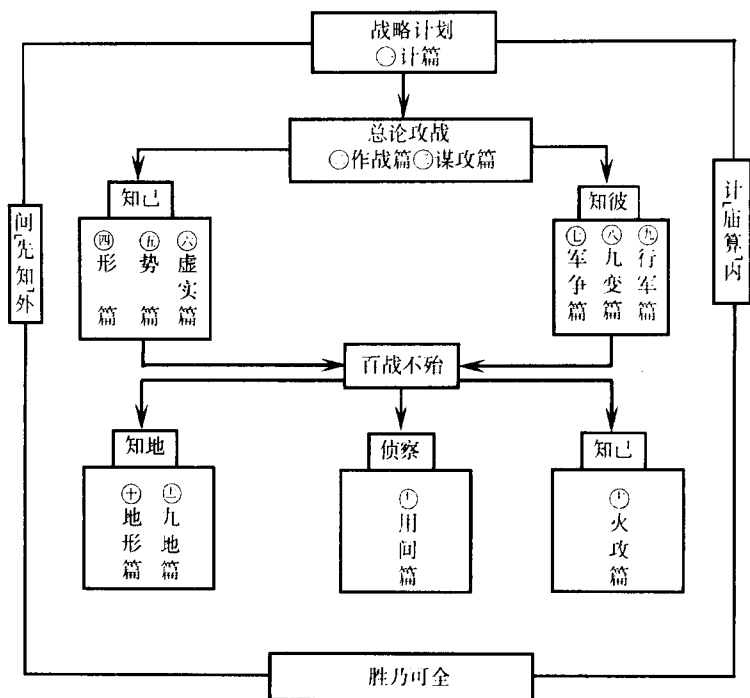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军事著作，也是切实有作者可考的第一部兵书。自其问世以来，对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学说发生了深远影响，被奉为“兵经”和“兵学圣典”。

《孙子兵法》十三篇主要讨论战争谋略问题,涉及作战原则、制胜条件和取胜技巧等问题。在作战原则上,主张以有道御无道,以正义制不义,国家至上,生民至上。在制胜条件上,主张强己备战,“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过,《孙子兵法》的主要内容,仍在于讨论作战谋略和技巧。书中提出了许多精辟警策的命题,诸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避实击虚”、“多方以误之”、“我专而敌分”、“因敌而制胜”、“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形人而我无形”、“有虞待无虞”等等。它的核心理论,共有三条:一是“奇正”,二是“机变”,三是“虚实”。

由于《孙子兵法》揭示了许多人类战争的共同特点,洋溢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光芒,不仅对中国传统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财富。长期以来,《孙子兵法》被译成英、日、俄、法、德、意、捷等十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一些国家的军队掀起了学习和研究《孙子兵法》热潮,其中尤以美、俄、英、法、日、德等国兴趣最浓,也受惠最深。日本的许多军事著作,都是以《孙子兵法》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美国国防大学将《孙子兵法》列为将军们主修战略学的第一课。美国将军的摇篮——西点陆军学校、印第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科罗拉多空军学院、国防指挥参谋学院等著名军事院校,都将《孙子兵法》列为学员的必修课。

《孙子兵法》的许多原则,还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市场竞争等诸多领域,成为我国谋略文化中最绚丽的瑰宝。

有关《孙子兵法》的第一个注本,是曹操所作。现在最流行的版本是《孙子十家注》,为宋人辑录三国曹操至宋代最有代表性的十家注,相当于集解。1953年中华书局出版《诸子集成》所收《孙子》即用“十家注”。目前社会上流传同样也比较广泛的《宋本十一家孙子注》是在“十家注”的基础上,将宋人的辑录亦算为“一家”而成。本书原文部分既以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6月出版发行的《宋本十一家孙子注》为底本编辑而成。



《孙子兵法》中心思想及结构图

第一篇 计 篇

提要

讲权变。先比较双方作战条件并制定计划,然后开战。比较的内容就是“五事七计”,作战要有计划,但不能拘泥于计划,“十二诡道”即是适应变化的一般做法。“五事七计”的庙算为正,“十二诡道”的权变为奇,此后各篇的主旨思想皆可溯源于此。

正文

始计第一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是军队生死搏斗的手段，国家存亡攸关的途径，是不可不认真考察的。

所以，要用五事去研究它，用七计去比较它，以求得对战争形势的认识：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就是要使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可以叫他们为君主死，为君主生，而不敢违抗。天，就是昼夜、阴晴、寒冬、酷暑、春夏秋冬。地，就是高丘洼地、远途近路、险阻平地、地域宽窄、死地生地。将，就是将领要智谋高超、赏罚有信、爱护士卒、勇敢坚定、明法审令。法，就是军事训练、管理教育、武器装备、军法军令。以上五事，将帅都不能不知道。了解这些情况的就能胜利，不了解的就不能胜利。所以，要用“五事”、“七计”比较敌我优劣，以求得对战争情况的认识。哪一方君主的政治开明？哪一方将帅的指挥高明？哪一方天时地利有利？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武器装备强利精良？哪一方的兵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执法赏罚严明？我们根据这些，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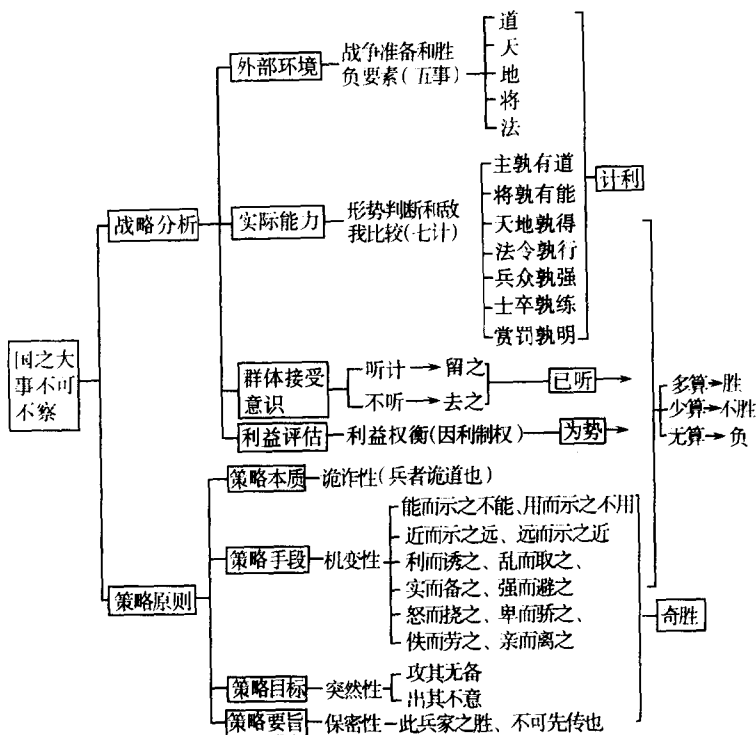
如果听从我的计谋，作战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作战一定失败，我就离去。

计算利害得失，意见已被采纳，然后就要造成有利的态势，作为外在的辅助条件。所谓有利的态势，就是根据于已有利的情况，而进行机动。用兵是一种诡诈之术。所以，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要打。向近处装作向远处，向远处装作向近处。敌人贪利，就引诱他；敌人混乱，就攻取他。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他；敌人兵力强大，就要避开他，敌将易怒，就激怒他；敌人谨慎，就骄纵他。敌人休整得好，就劳累他；敌人内部团结，就离间他。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这是军事家指挥的奥妙，是不能事先呆板规定的。

开战之前预计可以打胜仗，是因为胜利的条件充分；开战之前预计不能打胜仗的，是因为胜利的条件不充分。计算周密，条件充分的能胜利。计算疏漏，条件不充分的不能胜利。何况不作计算，

毫无条件呢？我们根据这些来看，谁胜谁败就端倪可见了。

结构图



《计篇》结构示意图

解析

《计篇》是《孙子兵法》的第一篇，主要讲如何在出兵前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各项基本要素进行科学的计算，从而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计就是计算。《说文》：“计，会也，算也。”《管子·七法》：“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算”。《十一家

注孙子》曹操注中说：“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庙算”就是指出兵前在庙堂上用一种叫作“算”的计数工具进行计算的一种决策过程。“算”是一种用竹木小棍或骨片削制而成的工具，一般直径一分，长为六寸，也叫“筹”或“策”，本来是古代数学上的计算工具，后来把它引入到军事运筹领域，用以直观地演示敌我各项因素的优劣，以便作出战略决策。古代所谓“定计”、“运筹”、“决策”，都是指出兵前的这种策划过程。

先计后战，不打无把握之战，是孙子的基本思想。在计筹过程中，孙子从战略全局上，分别探讨研究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和克敌制胜的基本原则，这些内容在以后各篇中又都有所反映或作专篇阐述，从不同侧面印证和发挥了这些原则，所以说《计篇》作为十三篇之首，是统摄这部兵书的总纲。

计篇共6个自然段，341个字，主要论述通过战略运筹和主观指导能力的分析，以求得对战争胜负的预见。

一、关于战略运筹

孙武从“慎战”的观点出发，要求对军事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一认识，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前进了一步。此句中“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相对为文，“地”与“道”互文见义，均指手段、方法。这就使我们明确地看出，战争之所以是国家的大事，就在于它既是军队生死搏斗的手段，也是国家存亡攸关的途径。孙武正是从这样的高度来考察战略运筹问题的。

“运筹”是从“算筹”演变而来的。我国古代早就有“算筹”的记载，把这种数字上的运筹术引向军事领域，是与战争在时间上、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战争过程复杂化紧密联系的。孙武在本篇中所说的“庙算”（即开战以前在庙堂计算出胜负条件的多寡）是关于战争决策方面的分析；孙武在《形篇》中又从战场内部的规律着眼，进行了类似于现代所谓战役容量等方面的分析。春秋时代远没有战略、战役、战术等科学概念，为了把孙武的军事运筹思

想在不同范围的应用加以区别,因此,我们把本篇“庙算”所包含的内容,称之为“战略运筹”。

孙武的战略运筹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了敌对双方有关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用他的话说,就是“经之以五,校之以计”。“五”就是“道、天、地、将、法”,曹操称之为“五事”。“计”是“五事”的重复,而不是另提新的内容。因为孙武的下文中提出七句设问,曹操称之为“七计”。其实“经之以五,校之以计”在文法上是互文见义。“五事”与“七计”,为什么是同义的重复,我们在谈到“法”这一“事”时再说。

“五事”之一的“道”,孙子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也。”这句中的两个“与”字都是“予”的通假字。全句显然是强令士卒服从国君的意愿。因此,我们不能把这里的“道”一般地释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按其本义,这里的“与上同意”与《谋攻篇》的“上下同欲”是同样的意思。《左传·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也有人说过“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可见,“道”应当是指军队内部与外部的团结与巩固。

看到军队内部的团结与巩固在战争中的作用,并不是孙武的发明。《左传·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所载蒲骚(今湖北应城县西北)之战中,楚国的斗廉就说过:“师克(军队获胜)在和,不在众。”并且以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之战为例证,认为周军以少胜多的原因之一就是“和”。“和”就是官兵的团结、内部的巩固。《管子·形势》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也是这样的意思。在这个问题上,孙武对于前人认识的发展,在于把这种内部上下团结一致的“道”,放在“天、地、将、法”的首要地位来考虑。他的这个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军事学家。《吴子·图国》继承孙武这一思想,具体提出了“四不和”不能出战的主张。它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到了《孟子》、《尉缭子》终于鲜明地发展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著名论断。

“五事”之二的“天”,就是天候。包括“阴阳”——昼夜、晴雨,

“寒暑”——寒冬、酷暑，“时制”——春夏秋冬。从更广泛的意义说，天时还应当包括天旱水涝、蝗灾、冰雹等等。孙武关于“天”的认识完全属于唯物主义范畴，这是很可贵的。当时的战争受天候条件的制约相当大，所谓“冬夏不兴师”。因为，秋季出师才便于因粮于敌。而且春秋末期以前的战争大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很少夜战。因为战争持续时间短，几个小时，最多一天即结束战斗。像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今河南鄢陵）之战，“旦而战，见星未已”（《左传·成公十六年》）从早晨打到星光出现，在春秋中期已属罕见的史例。孙武在《军争篇》中说：“夜战多鼓金”，则是对春秋末期战例的总结。当然，天候对战争的影响是从具体的作战对象所处的特殊地位说的。这里不妨举两个后世的战例来说明。例如，赤壁之战中，曹操在寒冬用兵，所以周瑜据此判断曹军战马缺乏饲料，是败因之一。而东汉马援进攻武陵蛮，则因盛夏士卒多染疾疫而失败。

“五事”之三的“地”，就是地形。关于各种类型的地形，孙武在《地形篇》、《九地篇》中有颇为详细的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孙武把地形条件是否有利作为判断胜负的因素，无疑是正确的。正如他在《地形篇》中所说：“夫地形者，兵之助（辅助条件）也。料敌制胜，计险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五事”之四的“将”，我们要在这里集中地作一点分析。孙武把贤能的将帅不仅看作是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且还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作战》），又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可以说，在十三篇中无不显露出孙武对将帅地位的竭力宣扬，对将帅条件的严格要求。固然，这里反映了孙武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是，必须看到，孙武强调将领的地位和作用，提出选将的条件和要求，又是与当时战争急剧发展的客观情况紧密联系的。

在春秋时代的深刻社会变革中，军事上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中曾简明扼要地指出：“甲士和车战的地位下降，徒兵和野战日益重要。这是和当时

社会变化有密切联系的。甲士是由平民中的上层充当的,庶人只能作徒兵。平民阶级瓦解了,甲士和车战制度也随之而崩坏。庶人地位上升了,地主阶级要从农民中征兵,徒兵和野战的地位也就提高起来了。军队中的组织也和农村中的什伍组织相一致的。军队中的指挥已经不是非贵族不可了。甚至战俘也有被提升为指挥官的,并出现了军功爵制的萌芽。”这是鞭辟近里的分析。特别是春秋末期,由于井田制的破坏,郡县制和征兵制的出现,各国兵额激增。原来周天子拥有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格局已完全打破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战部队增多了。例如晋国,春秋初期的城濮之战时只有兵车 700 乘(约 21000 人),到鲁昭公十三年,平丘之会时,晋国有兵车 4000 乘(约 120000 人)。又如齐国在公元前 484 年吴齐艾陵之战时,一战就损失兵车 800 乘。当时吴国是四军,比齐军优势,其总兵力也有十几万。二是武器装备提高了。不仅铁兵器使用于战场,南方的吴、越、楚等国还有“余皇”之类的大型战船。三是战场地域扩大了,从平原旷野扩展到山林沼泽和江河湖海。我国第一次海上登陆作战就是公元前 485 年吴鲁联军的伐齐之战(《左传·哀公十年》)。四是战争持续时间延长了。例如吴楚柏举之战打了 11 天,越灭吴围困姑苏竟达 3 年之久,战斗的激烈程度有所加剧。五是作战方式复杂化了。由于徒兵进行野战,因而出现了奇袭、迂回、包围、伏击、侧击等战法,战场流动性增大,机动能力提高。

这一系列新的变化、新的特点,都向军队提出了提高指挥效能的新要求。原来,古代作战“出将入相”,文武是不分职的。据《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 660 年)》载,晋国大夫说:“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意思是说率军作战,对作战方案定下决心,部署实施,是国君和正卿的职责。但是,到了春秋末期,这种现象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因此,“将”这一崭新的事物终于出现在我国的军事舞台上。据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统计,这一时期的将军有:狐夜姑在晋国为将,孙武在吴为

将，子重、子常、屈完在楚为将，司马穰苴在齐为将，詹伯在郑为将，慎子在鲁为将，子文在卫为将，等等。这些专职将领的出现正是随着战争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那么，面对当时的战争，孙武对将领提出了哪些要求呢？这就是“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这五条做将的标准，习惯上称为“五德”。古人说，孙武尚智，孙臆贵势，是很有道理的。孙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表明了他对指挥才能的重视。作为将领的主要职责首先也应当是斗智。他认为，一个“贤将”对于关系全局的“五事”必须要有深刻的了解（“凡此五者，将莫不闻”），对于复杂的、易变的、矛盾的战场情况要能灵活处置（《九变》：“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良好的应变能力（《地形》：“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要善于周密地计算敌我兵力对比（《地形》：“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地；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等等。由此可见看出，没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良好的军事素养，没有综合判断的洞察能力和高人一筹的预见能力，是不可能胜任贤将之责的。

孙武对才智如此重视，如此强调，正是对当时许多血的教训的总结。正面的例证如齐鲁长勺之战，曹刿“一鼓作气”的作战指导，取得了打败齐军的胜利，这是由于指挥高明而获胜。反面的例证，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蠢猪式战法是人尽皆知的。还有公元前597年，晋楚两军在邲（今河南荥阳北）发生的一次大规模遭遇战中，晋军之所以惨败，就是由于主将荀林父指挥无能，迟疑坐困，并错误地下达渡河的命令，以致“舟中之指可掬”的（士卒因争相渡河逃命，先上船者用刀砍断后爬船者的手指，这些被砍断在船舱中的手指可以满把地捧起来）。

除指挥才能外，孙武也十分强调将帅要有良好的精神素质。对国家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对士卒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